

论逻各斯在《圣经》文本中的解构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周可戈

摘要:《圣经》确立了一个至高无上和主宰万物的形象——上帝,体现了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西方世界继希腊文明后逐渐形成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圣经》漫长的成书过程和众多编撰人决定了文本内部的解构性,其解构精神是西方众多领域继承的精髓。

关键词:圣经;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继承

一、圣经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成

《圣经》原意为“若干小丛书”,主要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旧约》涉及神话、传说、史诗、小说、抒情诗、智慧文学和先知文学等类型,主要思想有:一神崇拜思想、“原罪说”和“救赎”观念、“上帝的选民”和“立约”思想。《新约》有福音书文学、纪事文学、书信文学和启示文学四种类型,主要内容是救世主耶稣的出现。《旧约》、《新约》都肯定上帝的存在,题材均为上帝向人显示的道路和上帝与人的关系,体现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自然和人是上帝的产物,历史是上帝旨意的外在显示,知识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国家是神授的社会秩序。而人对上帝无条件的信仰和敬奉、向上帝感恩和忏悔、神灵的拯救是两部分共同的主题。《圣经》确立了上帝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的形象和神灵信仰。

“逻各斯”的词根是希腊语中的 logos,意思是“语言”或“定义”。在两千年前的希腊哲人那里,逻各斯被看作世界万物生成和相互交换的定则,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的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萌发于古希腊社会晚期的柏拉图的理式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基督教传入欧

洲大陆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上帝创造世界及天国与地狱对峙的学说逐渐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合流”,上帝成为主宰一切事物的超验力量——逻各斯,事物均以他为中心,受他支配。人以遵从上帝的旨意为善,有了过失须向上帝忏悔,等待上帝的拯救,而后向上帝感恩。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以逻各斯为中心,主张的确存在一种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的理念,逻各斯中心主义得以蓬勃发展。

二、解构主义的内涵

解构主义的先驱是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奥地利精神分析专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4[55-56] 代表人物有拉康(Jacques Laca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明确提出这一术语是德里达,他在1967年出版的三本书《论文字学》、《书写和差异》和《声音和现象》透彻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中的“解构”原意是破坏,后被用来指揭示、分解和消解,解构主义致力于打破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

解构主义认为,在特定的场界里存在特定的、高于一切的能够疗治、救赎人类整体的本质规定的信念已不能被信服,要从根本上解除任何中心的存在。同样,逻各斯中心主义制造的无数的、一方位居强势,支配甚至决定着另一方的二元对立,要在特定情况下加以颠覆,带来的结果是差异的被抹平和价值的不确定性。

三、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圣经中的解构

捍卫江山社稷的朝庭忠良的“罕言利”和“以身殉国不见知而不悔”的高尚德行,从而支撑起当时腐败的明代朝庭中一块未被玷污的洁净天空。孙承宗的人格操守和坚定的价值选择,不仅在他当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而且就中国当下社会而言,亦会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

当今正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我们的社会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着美好的前景快步迈进。但是毋庸讳言,在我们社会的某些局部确也出现了一些人性沉沦,道德滑坡,虚假丑恶,不知廉耻,甚至以丑为美等社会现象。例如,一些人社会责任感荡然无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人的私欲和享乐欲望急剧上升,以居豪华住宅、坐名贵轿车为荣,以食山珍海味、喝高档洋酒为尊贵,以穿名牌服饰、进豪华娱乐场所为追求,以升官做官、前呼后拥为气派,以经营官场、背后有靠山为目标。这些义利混淆,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的丑陋行径,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了冲击,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掺杂进一股极不和谐的噪音。

在社会正在进入全面市场化转型的时期,旧的传统价值观从整体上而言已经不再适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尚处于建构时期,这是转型期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我们现在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求利益原则、等价交换。无疑,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人们只有首先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早有古语云:“仓廩实

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物质生活得到了丰富和满足,才能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为社会的进步提供基础。所以在当前现实的市场经济生活中,像孙承宗那样只重义而忽视利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理想形态的行为模式。但是,市场经济又是一种道德经济和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吁者以公正廉洁、诚实守信、富于责任感为基础内容的新道德体系的建立。如若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只是单纯逐利,不讲道义,就会形成私欲扩张、急功近利、恶性竞争、损害整体利益的污浊社会环境,这样情形不仅会阻碍社会发展,最终也会影响个人正当利益的实现。在当前形势下,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体系的创建已经刻不容缓。我们研究孙承宗的人格操守,可以为当今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的重建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论语·子罕》。
- [2]《论语·里仁》。
- [3]《论语·宪问》。
- [4]《论语·述而》。
- [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 [6]鹿善继,《鹿忠节公年谱》。
- [7]《管子·牧民》。

邶下公宴诗：先秦宴饮诗的继承和发展

□山东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 杨 倩

摘要：公宴诗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邶下文人在宴游诗的创作上接受了《诗经》宴饮诗的影响，同时在创作目的、表现性能上也有了新的发展。

关键词：公宴诗；邶下；《诗经》

公宴诗是指官家宴会所赋之诗。在公宴诗的发展进程中，建安时期是重要阶段。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文人在公宴诗歌领域进行了规模性的创作，数量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不殊的成绩。《文选》卷二十设“公宴诗”一类，收录曹植、刘桢、王粲等人

的诗作十四首。后人对这类作品相当重视，陈祚明称曹丕的《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诗》为“建安正格”，叶燮说：“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公宴创作始于先秦，兴于魏晋南北朝。邶下文人在继承前代同类题材作品创作的基础上，又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使其具有了时代品格，并开六朝文人及后世大量创作公宴诗的风气，在公宴诗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诗经》中的公宴诗多在雅诗之中，约有三十余首，以君臣、

解构主义源于19世纪，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千多年来，无论是作为宗教典籍还是作为文学经典的《圣经》对西方文明的影响都是巨大、深远的，其影响程度没有第二本书能与之较量。即使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人们对它仍持尊敬的态度，只是理解更加世俗化。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的分裂说明了固定意义模式的不复存在，现代主义美学运动纷纷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然而《圣经》漫长的成书过程和不同时期的众多作者决定了其内容的不一致性，逻各斯已经在《圣经》文本中被解构了。

逻各斯在《圣经》中就是上帝，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主宰一切事物的超验力量，也是至善、仁慈和正义的化身。然而他这个形象在《旧约》中有些怪异，时而安排万物的存在和发展，俨然一个操纵一切事物的力量和超然的叙事者，时而又跳上舞台，成为一个实在的剧中人，但全书对他没有一次正面的肖像描写。而他的仁慈和正义在《创世记》的神话故事中已有颠覆，如：

挪亚是个义人……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上帝对挪亚说：“凡是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结果，洪水泛滥，除挪亚带入方舟的以外，地上的人、鸟、虫、兽等各类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试问，各种动物有何罪恶？上帝降雨带来的洪水淹没大量生物难道是仁慈之举吗？与上帝立约的挪亚后来喝醉酒赤身裸体地躺在帐篷里，其儿子含将此事告诉了弟弟闪和雅弗。挪亚酒醒后非常恼怒，责令含的儿子迦南为闪和雅弗的仆人，挪亚最后寿终正寝。难道挪亚就是完人？这种行为就是上帝希望见到的正义吗？

上帝代表一切事物的理性，却总是迁怒于追求理性的人，惩罚越轨的人，如伊甸园里偷吃智慧树果子的亚当和夏娃、建造巴别塔的人们，无条件信仰和敬奉上帝的人才可能得到上帝的垂青和拯救，如准备牺牲自己百岁得来的嫡亲独子为上帝献祭的亚伯拉罕、做事没有一点胆量和魄力的摩西。雅各通过欺诈的手段赢得了父亲的祝福——上帝的亲睐，为什么上帝这个

主宰一切事物的超验力量对此却不能明察秋毫呢？还有大卫，扫罗既然因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上帝的命令（杀尽亚玛力人及其牲畜）而被上帝废弃，为什么大卫在经历了通奸、子女乱伦、凶杀、内乱等一系列违反十戒的事后仍能稳坐帝王宝座呢？难道理性也是模棱两可、漂浮不定的吗？

四、解构对后世的影响

正是由于其中隐含对逻各斯的解构因素，《圣经》才具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基督教的信徒至今仍为为世界三大宗教之首，各时代的西方人，无论信教与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们的启蒙读物《圣经》的影响。发生于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教会营垒内部进行了伟大革命，各种新教派别应运而生。信仰基督教的人们摆脱了天主教独断专横的“黑暗时代”，思想获得解放的人们开拓创新，促进了各门学科的高速发展。

《圣经》在西方又被称为“唯一的书”(Man of One Book)或“好书”(the Good Book)。是以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唯一读过的书。美国著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几乎没有上过学，但他却从这本经典中吸取了足够的营养，为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他们从《圣经》中传承了质疑的精神，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解构逻各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提出了相对论。

直到19世纪的欧美文学家很多都具有浓郁的宗教背。弗来(Northrop Frye)认为，《圣经》是“伟大的代码”(the great code)，一般文学作品是由《圣经》这一“神圣经典”(sacred scripture)演化而来的“世俗经典”(secular scripture)。7[163] 弥尔顿的《失乐园》对《旧约》的伊甸园加以了自己的诠释和演绎，而他本人却不自觉地站在了撒旦一方。哈代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描绘主人公亨察尔因酗酒卖掉妻女，铸成大错。他在临终前悔恨交加，自叹：“我，该隐，一个被逐者、流浪汉，罪有应得，我还能承受更严厉的惩罚”，与该隐的“我不能承受如此大的惩罚”反其道而行之。《红字》的主人公海斯特胸前佩带的“A”，本代表通奸女犯(Adultery)，然而她的勇敢和坦诚打动了人们，后被视为荣耀的象征——能干(Able)和天使(Angel)。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可谓解构逻各斯的极品，汉埃斯特拉冈和弗拉吉米尔等待的戈多(Godot，被普遍理解为上帝)在落幕时也没有出现，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文学作品中对逻各斯的解构不胜枚举，而解构的源泉主要还是来自《圣经》。